

序论：水流文化历史中

到太空俯瞰我们居住的这星球，我们只看到一个绿色的泥丸在那里转动。这绿色不是森林，不是草原，而是像包皮一样裹着这星球的大海。在太空人或外星人眼里，这星球简直就是一个水球。这星球的表面，有超过 75% 的区域被蔚蓝色的海水所占据。平原、丘陵、高山与沙漠，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，九牛之一毛。就连人类引以自豪的五大洲，亦不过是这水球上的一座座孤岛。相对于水，人类居住的这陆地，实在小得可怜。与其说人类是一种“陆上”生物，不如说他们是一群“岸边”歇客。

人类文明经历的这几千年，只不过是某种水中生物上岸歇息的短暂一瞬。就像一个长距离游水的人，免不了要爬到岸边喘口气，人类这种生物也正是在上岸喘气的当儿，如孩童游戏一般，“创造”了吾人引以自豪的“陆上”（“岸边”）文明。人类终归要回到水中去的。在“岸边，人类说自己是起于泥土又归于泥土；但从生物进化的全过程去看，实只能说人类是起于绿水又归于绿水。人类在“岸边”的歇息，终有一天要结束。到那时，滔天的洪水又会再次淹埋人类在“岸边”歇息时“创造”的文明；说不定也还会再次幸存一叶方舟，留下下一轮文明的种子。

1. 水泡着的宗教、神话与哲学

“岸边”的这一轮文明正是从洪水开始的。《圣经》中“洪水灭世”(Deluge)的记载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如何在洪水中毁灭,又如何从洪水退去后新生。上帝见不得人世罪恶弥漫,便决意用洪水毁灭地上的一切生灵。唯“义人”挪亚,蒙上帝宠爱,得造长形木柜,率家人及每种禽兽各一对,避开洪水袭击,做这一轮文明的始祖。巨泉的喷涌和四十天连降的大雨,告诉我们那时的人类遭遇了怎样的没顶之灾。中国的道教典籍,亦有“巨海”的记载;“八仙过海”的传说,更是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。

在几乎所有民族的神话传说中,都有关于“大水居先”的记载,就是相信人类居住的这星球,是先有大水而后有陆地,而不是相反。满族天地形成的神话,认为大地乃是阿布卡恩用神土所造,在此之前只有洪水;布里亚特人的创世神话,认为世界开初只有水,以及水中的一只大龟,天神命大龟仰于水上,才得在它的肚皮上造出大地;吉尔吉斯人神话也说宇宙之初,只有一片汪洋大海,海之正中有一石板,石上立一黑色公牛,大地只在那公牛之头的角上;类似的说法,也在塔塔尔人中广泛流传。有水然后有陆地,是世界上诸多创世神话的共同主题;滔天洪水是如此深刻地映遗在先民的脑际,以致“洪水”的传说竟变成为全部人类的“集体无意识”。据学者的考察,光是亚洲大陆东、南、北边缘及其海域,以及太平洋岛屿流传的神话,就有至少四种“水托大地”的说法。一谓神造岛后,岛在海上流动,飘浮不定,此为“流岛型”;一谓远古巨人在海中钓鱼,钓上的却是岛,此为“钓岛型”;

一谓远古人类用了很长时间才在海中找到一块陆地定居，最后却发现原来只是住在鱼（或龟）背上，此为“鱼岛型”。最后一种是谓神用粘土或泥造出大地放到大海中，浮在水面，然后又命某种神物驮起它。这些神话的共通点，是认为大地被水包围，陆地只是浮在水面的神造物。由此形成“天连水，水连天”之“宇宙海”世界观。

各民族神话传说里另一个共同的主题，是所谓“洪水泛滥”。《尚书·尧典》“汤汤洪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”，《益稷》“洪水滔天”，《吕氏春秋·爱类》“昔上古龙门未开，只梁未发，河出孟门，大溢逆流，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，尽皆灭之，名曰鸿水”等记载，说的是这泛滥洪水；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“共工氏振滔洪水，以薄空桑”之记载，说的是这泛滥洪水；特丹江地区洪水神话，说洪水泛滥，阿布长赫赫给人世扔下神奇柳枝，拯救生灵，说的是这泛滥洪水；遍布许多民族的洪水泛滥后葫芦保存人种的神话，尽管情节略有差异，但所涉及的亦均是这泛滥洪水。由此可以推知，“洪水泛滥”也许是我们人类祖先的共同遭遇。地球上目前的文明，正是在这泛滥洪水之后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。

水不仅最早出现在各民族宗教、神话中，也最早出现在各民族之哲学中。水，以其特有的品性，第一个进入哲学家的视野。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士（约公元前 624—547 年）就把水作为万物的始基提出来，认为水无穷无尽，永不消失，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。其后原子论的思想先驱恩培多克勒（约公元前 495—435 年）又用“四根”去解释世界，其中有一根就是“水”。至于中国哲学，其全部观点的两个最早的源头——阴阳与五行，同样首先涉及到水。阴与水属同

一序列，自不必传言；而其观念被称为“阴阳说”而非“阳阴说”又正表明阴水对于阳的牢不可破的优先地位。“五行说”更是如此，《尚书·洪范》提到五行时，首先论列的便是水：“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……润下作咸……。”中国先哲的哲学思维，无疑亦是从水开始的。可以说，中西哲学的全部观念，差不多都是从水中生长起来的。

2. 中华文化从水开始

说到中华文化，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黄河。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仅这两句话，就足以显示黄河水对于中华文化的巨大意义。没有黄河，便没有中华民族，没有黄河水，便没有中华文明，这样的断语恐怕一点也不过分。考古学、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，人类的几乎所有文明，都是起源于水边，中华文明当然亦不能例外。黄河之于中华，恰如恒河之于印度、两河之于巴比伦，以及大海之于希腊。黄河、长江与珠江，构成为中华文化须臾不可离的三大主要血脉。

我们的祖先“观其流泉”“度其隰原”（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），首先总是择取河谷地区或水源充足之肥沃平原定居和生产，这一方面固然有水利灌溉之便，可以以水为生、以农立国，另一方面，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泽，却又常常招来洪水之灾。我们的先人，不得不世代同洪水作斗争。中华民族以治水而闻名于世，中华文化之基本格局，可以说正是在这治水中奠定的。

“治水平土”的大禹及其影响，乃是中华民族现存文明之巨树的根基，从某一方面代表了华夏民族文化创造之成就及其艰苦历程，成为民族精神之化身。大禹既是治水斗争之神人、部落战争之枭雄，又是制造铜器之匠神、德人贤君之表率。“大禹治水”的传说，差不多已不是一种神话，而是一种现实，一段真实的历史。中华现存文明的基调，便是定于这段历史。大禹的功绩 明载于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先秦典籍。大禹治水，“劳天下而死于社”的业绩 亦明载于上述典籍及《淮南子》、《尸子》、《吕览》等文献中。《墨子》称“昔者禹之湮洪水，……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，腓无胈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”，可见大禹治水之忙、之艰辛。为了治水，他累得面目黧黑，甚至半身麻痹；为了治水，他顶风冒雨，十年不能归家；为了治水，他放弃了一切享受，最后死于劳累。中华文化所崇拜的人格精神，是大禹奠定的；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，最早便是体现于“大禹治水”的伟大事业中。

汉民族洪水传说中，除了“大禹治水”的传说外，还有“女娲补天”、“精卫填海”等传说 这些传说亦与水紧密相联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述：“女娲补天”云：

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，火 熾炎而不灭，水浩洋而不息。猛兽食颛顼民，鸷鸟攫老弱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。

苍天补 四极正 淫水涸 冀州平 狡虫死 颛顼民生。

可见“女娲补天”之传说，不只是讲“补天”，还讲到了“治

水”、“正极”和“屠龙”。尤其“治水”，更值得我们重视，因为据考证，人类在远古遭遇特大洪水，乃是一个事实。

挪亚洪水，据希伯莱人的年表推测，约发生于公元前 2448 年或 2345 年；大禹治水，据推断约发生在公元前 3000 年的后期；女娲的“止水补天”，与大禹的“治水平土”，当是发生于同一时期？

关注到水的文化意义，除了汉民族外，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，亦不无涉及。如“仰韶人”在公元前 6000 多年前，便已意识到水的象征意义。他们在装殓夭折之人的瓮棺盖上绘上“人面鱼纹”，象征其重归子宫，投胎再生，——就像鱼在水里（水象征母体）游来游去。再如赫哲族人，他们认为阴间与阳间以河（他们称为“三银彼拉”）为界，此岸为阳，彼岸为阴。人死去时，他们在每位死者手中放上一把桨，好让他们摆渡到彼岸。云南德昂族人也十分重视水的文化意义。他们把棺材视为“船”，认为棺材乃是死者灵魂渡仙河之具。人将咽气，生者便把一枚银币放到死者口中，以作过仙河之渡资。还有广西壮族、毛难族“买水洗浴”的葬俗，均无不表示水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。

对于这些民族的先人而言，死乃是新一轮生命的开端，而水正是完成此再生过程的一个必备条件。水象征着胞血，象征着羊水，象征着母体，水在“生育——再生——死亡”之过程里，有着稳定的象征意义。

3. 中国文人的水氛围

想到传统中国文人之生活，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“渡

口”“桥头”“扁舟”“天涯”“港湾”“雨巷”，一类与水有关的地与物，以及“流浪”“漂泊”“浮沉”“淡泊”一类与水有关的事。因为传统社会交通以水路为主的关系，水与中国的文人，似乎有一种特别的缘份。这当然不是因为只有文人才能见到水，不是的，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都经常地遭遇水，而只是因为文人有一颗不同于常人的敏感的心，以及一份不同于常人的坎坷的经历。有了这心和这经历，人们经常遭遇却又经常“视而不见”的水，才在文人那里获得深厚的文化意蕴。水而带有某种文化味，是中国的文人造成的。

水而进入到文化中，构成中国文化一道特别的风景。这风景，便是中国文人第一层的水氛围。随便翻开哪部中国的文化典籍，我们便能见到这道风景的层层画面。

当我们谈到“一羽示风向，一草示水流”这句话时，心中总浮现出一幅特别的图景，仿佛看到潺潺流水之中，一株柔弱的小草，在那里摇头晃脑。水作为一种象征，在中国文化里有极普遍的应用。像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”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“雨过地皮湿”之类的警言几乎随处可见。

当我们读到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这句话，我们首先想到恐怕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以及前面那句泣血的发问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”一江春水，在这里成了后主寄托哀怨的最好物象：没有什么东西能如这一江春水，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后主的寒心与忧愁。水在这里不是快乐的象征，而是苦寒的象征：水似乎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类似的象征还有“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”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”等等。

对于身处逆境的人，中国文化里也有很多与水有关的劝慰。如“一网打不尽天下鱼”、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、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、“狂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”以及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等等。

关于水的不好的一面，中国文化里的说法还有很多说到水的威力时，有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之说，亦有“水壅而溃，伤人必多”、“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”之说；说到水的可怕时，有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之说，亦有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之说；说到水的无奈时，有“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”之说，亦有“泼水难收”或“覆水难收”之说；说到水的无情时，有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”之说，亦有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”之说，更有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”、“跳进黄河洗不清”、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之说。

当然，水亦有友善的一面。传统文人常常用水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谊，如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、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、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等等，均是表达这方面的意思。要说明先善于人然后才能指望人善于己的道理，就用“不行春风，难望夏雨”一句来形容。说一个人心胸宽广，大肚能容，就用“宰相肚里好撑船”来形容。说一个人得到了及时的帮助，有“久旱逢甘雨”之形容。说人各有志，人各有归，有“雁归海滨，鸡落草棚”之形容。又用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、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等，说明就近的好处；用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等，说明同道之间的心照不宣；用“太山不让土壤，河海不择细流”等，说明某人心胸的广阔；用“井水不犯河水”等，说明界限的分明；又用“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”等，说明某人的稳健；更用“放长线，钓大

鱼”之类，说明某人的深谋远虑。

水，仿佛可以拿来形容任何东西。水，可以用来形容人世兴衰的无常，如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之类；可以用来形容誓死不变的雄心，如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之类；可以用来形容女子的柔情及传统社会嫁女的现实，如“柔情似水”、“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”之类；亦可以用来形容人事的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、有所破才能有所立，如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”之类……总之水在中国文化里，好像是最无定性、最不专一的东西，是最靠不住、最不能持久的东西。

比如海水，一方面它与人心叵测联系在一起，如“人心难测，海水难量”、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”等等；另一方面它又跟心襟的广阔联系在一起，如“海不辞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辞石，故能成其高”、“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”以及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等等；同时它又成为有某种强烈差异的对比物，如“不积细流，无以成江海”、“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”以及“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间者难为言”等等。似乎海水是可以任人评说的。

中国文化里三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水描写，恐怕是如下三条：（1）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；（2）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；（3）“常在河边走，难免不湿鞋”。第一条涉及人的性情，第二条涉及人的生计，第三条涉及人的品格。在第一条里，水是知者的象征；在第二条里，水是生计的一端；在第三条里，水便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。水之于中国文化，确实奇特而又高妙。

中国传统文人的水氛围，是奇特而又复杂的。除了上述所谓社会的与语言的层面外，还有所谓文字的、政治的与战

争的层面，尤其是战争的层面。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角斗中，战争是唯一的最后解决方式。而水又在某些关键场合，决定了战争的成败。这样水与战争，就发生了某种不仅是实际上的，而且是文化上的关联。

发生在公元前 638 年的“泓水之役”就是因为水而延缓了宋国业已开始的霸业。齐国霸业衰落以后，宋襄公兴起了与楚争霸的雄心。周襄王十四年（公元前 638 年），宋举兵攻郑，楚伐宋以救郑。两军战于泓水（今河南柘城西北），楚军渡河，宋襄公不以为然，以“君子不乘人之危”为理由，拒绝了大司马公孙固主张出击的建议。楚军既渡，在水边尚未排成阵势，公孙固再请出击，宋襄公仍以“君子不鼓不成列”为由予以拒绝。楚军排好阵势后开战，结果宋军大败，宋襄公亦受重伤而退。宋国霸业的受阻，正在于宋襄公并不懂得水在这次战役中的重大意义。

160 年后，东南的吴越演就了另一幕喜剧。这一次的越军，正是充分利用了笠泽江水，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发生在周敬王四十二年（公元前 478 年）的这场越吴之战，吴师 6 万，越军只有 5 万，本来吴师要占优势。但当两军对峙于笠泽江畔（今江苏吴淞江南），双方均不能取胜时，兵少的越军首先想到了水的作用。入夜，越左右军溯江五里，夜半鸣金渡江，至水中央而不进，引诱吴军分兵来御。待吴分兵五里外，越之中军衔枚渡江，偷袭吴军中营，吴中军大乱。已分之吴军急欲回救，又遭越左右军登岸阻杀，吴军终于大败。此次战役可以说越军是胜于水，吴军亦是败于水。

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，实在是太多了。绿林军泚水败莽军（公元 22 年），奠定起义军成败之基础，是一例；瓦岗

军大败隋军王世充部于洛水（公元 618 年），反败为胜，是一例；浙东农民军以三溪之水淹没官军（公元 800 年），声振中原，是一例；岳飞逼杨公起义至岸上，使其水战特长不得发挥，杨公起义至此失败（公元 1135 年）是一例；石达开阻于大渡河，又恰逢暴雨洪水，无以渡河，终致全军覆没（公元 1863 年）是一例；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，解放江南大片国土（公元 1949 年），亦是一例。

中国历史上与水有关的最著名战例，恐怕要数“垓下之围”、“淝水之战”、“四渡赤水”及“卢沟桥之战”。这一类的战争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改写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历史。垓下之围，项羽不肯过江东，最后自刎乌江，刘邦自此建立刘汉天下（公元前 203 年），影响中国几千年；淝水之战，晋军利用渡河之机大败秦主苻坚，从而大大延缓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南侵（公元 383 年），影响中国文化至深至远；四渡赤水，中央红军成功地摆脱敌军围追堵截，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（公元 1935 年），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现代史；卢沟桥之战，日军开始全面侵华，把中华民族拖进长达八年的艰苦战争岁月（公元 1937 年）几乎改变了每个中国人的命运。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水似乎常常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。

中国的文人，就在这样的一种水氛围中，繁衍生息。水对于他们，不仅是生命之源，而且是精神之源，文化之源。水不仅养育了他们的肉身，也养育了他们的精神与灵魂，养育了他们的人格与理想。他们在水中看到远古，看到当下，也看到自己与民族之未来……

章一

诸子临水

——悠长而又哀婉

中国的文人，既有这样丰厚的水氛围，临水而慨叹世事人生，便是常有的事。没有了水，我不知道中国文人之形象，会干瘪成什么样子。

1. 孔圣人临水：乐乎水而浴乎沂

最早最伟大的临水者，恐怕要数孔丘孔仲尼了（公元前551—479年），他后来被尊为圣人，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；其实在当时，他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并不死板，也并不苛严，更不道貌岸然。相反，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，他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喜怒哀乐从不窃藏于心。他在他的学生面前，从来就不是一副“师道尊严”的死面孔。他的性情与人格，似乎处处都受到了水的浸染。

《论语》首次提到“水”便是孔子向他的学生陈述的“乘桴浮于海”的悲壮宏愿。他对他的学生说：“假使我的王张不得施行，我就坐个木排向海上漂去，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？”我不知道孔子是否见过大海，但我敢断言大海肯定早就进入到孔子的心中。以孔子的聪明，他不会不明白自己的主张之肯定不能见容于当时，只是因了他对于理想的太过热爱，才义无反顾地走上“知其不郡”，隐藏了多少苦痛与心酸。

从这里我们亦可以看到孔子之对于水的特别青睐。在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，人们常常想到的是“隐遁山林”，伯夷、叔齐誓不食周粟，饿死于首阳山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唯独孔子想到了海，想到了水，想到了漂流海外的水上远梦。这不是一种普通的选择，这选择里透着一种人格与性情。伯夷、叔齐是儒者所尊崇的，但他们的“隐遁山林”却为孔子

所不许，这是一种人格与性情。伯夷、叔齐是儒者所尊崇的，但他们的“隐遁山林”却为孔子所不许，这其中不能不说有很深的文化意蕴。

《论语》第二次提到“水”便是孔子那句著名的彪炳千古的话——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水是“动”、是“乐”，山是“静”、是“寿”，故孔子又曰：“知者动，仁者静，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在这里孔子再一次把“水”摆到了“山”之前，显示出“水”对于“山”的优先地位。这和孔子认为“乘桴浮海”优于“隐遁山林”的立场，是一致的。孔子说：“知水仁山”，而不说“仁山知水”，是有其深意的。

韩婴之《韩诗外传》卷三，曾对于“知者乐水”有一个解释，它说：

夫水者，缘理而行，不遗小间，似有智者；动之而下，似有礼者；蹈深不疑，似有勇者；障防而清，似知命者；历险放远，卒成不毁，似有德者。天地以成，群物以生，国家以平，品物以正，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。

此是韩婴的解释，合不合孔子原意，不敢速断。孔子之尚水、乐水，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从这水中看到了他所崇尚的德。水而有德，也许并不是孔子每临水必生感慨的主要缘由。但《荀子·宥坐》篇之记载，却进一步加强了此种趋势。荀子记载说：

孔子观于东流之水。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，是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夫水大编与诸生而无为也，似德；其流也，埤下裾拘，必循

其理，似义：其泔泔乎不涸尽，似道；若有决行之，其应佚若声响，其赴百仞之谷不惧，似勇；主量必平，似法；盈不必概，似正，淖约微达，似察；以出以入，以就鲜絜，似善化；其万折也必东，似志。是故君子欠大水必观焉。”

韩婴只提到了水的智、礼、勇、知命、有德五种德，荀子在此之前却早就悟到了水的德、义、道、勇、法（平）正、察、善化等八种德。荀子认为，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，正是因为他认定水具备这各种的德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荀子的观点，而不是孔子的观点，虽然荀子的话是借孔子之口而道出。

我们了解孔子唯一较为可靠的依据便是《论语》亦只能是《论语》。但翻遍《论语》我们找不到孔子尚水是因为水之有德的记载。相反，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把水与德是区分得很清楚的。他讲“知水仁山”，实际上是把德赋予了山，仁者乐山，只因为山具备仁者所向往的德。水没有这样的德所以仁者不乐水；山具备这样的德，所以知者不乐山。在这里，知者和仁者，是两类不同性情的人；知者尚动、尚乐，而仁者尚静、尚寿。孔子尚水，所以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仁者。

从广义去看，“知（智）”当然亦是一种德，但孔子讲到乐水时，所说的“知”无疑并不是广义的“知”，而是狭义的“知”。简言之，是与“仁（德）”相对反的“知（智）”。所以我们对于这里的“知”，也只能从狭义上去理解。“知”是一种理智、一种智慧，而“仁”却是一种道德、一种德性；“知”讲现实、讲突然，而“仁”却讲将来、讲应然。孔子倾向于视自己为“知者”，这从他对于水的重视与崇尚中，可以